

DOI: 10.16482/j.sdwy37-1026.2016-06-001

批评话语研究专栏 (主持人: 苗兴伟)

主持人按语: 批评话语分析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批评语言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批评话语分析在基本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 将社会批评理论与话语分析相结合, 逐渐成长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近年来, 批评话语分析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研究议程, 完善了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 逐步进入了“批评话语研究”的新阶段。批评话语分析始终以社会问题为导向, 致力于通过话语分析揭示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不平等, 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本栏目的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批评话语分析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 从批评话语分析到批评话语研究”一文阐述了批评话语研究面对来自现实社会和各种理论的挑战所进行的创新努力, 讨论了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从批评话语分析到批评话语研究的发展和变化。“批评话语分析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路径”以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根深蒂固的联系为出发点, 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看作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种路径。本文认为,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的同时, 积极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践, 发展了建构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完善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路径。“商榷性评课话语的困境剖析和修辞突围”一文基于评课实录语料, 探讨了商榷性评课话语的困境, 分析了影响商榷性评课话语量的要素, 提出了评课冲突话语的风险规避策略和逆耳忠言的话语修辞策略。“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进展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1995-2015)”一文以1995-2015年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发表的期刊论文作为语料, 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绘制了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科学知识图谱, 梳理了国内批评话语分析20多年发展的整体脉络和总体趋势与特点。

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 从批评话语分析到批评话语研究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天津 300204)

[摘要] 将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社会学范式加以区分, 进而聚焦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从批评话语分析到批评话语研究的发展和变化。在讨论批评话语分析精髓和洞见的基础上, 阐述批评话语研究面对来自现实社会和各种理论的挑战所进行的创新努力, 认为新一代的批评话语研究学者在继承第一代学者(如福勒)和第二代学者(如费尔克劳、范代克、沃达克等)学术思想的基础上, 正在把语言学范式的话语研究从“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阶段推向一个新的“批评话语研究”阶段。

[关键词] 话语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研究; 范式; 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2643(2016)06-0003-07

Linguistic Paradigm of Discourse Studies: Developing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TIAN Hai-long

(Centre for Linguistic Semiotic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收稿日期: 2016-09-10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与国际学术话语的交流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4BYY07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田海龙,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批评话语分析、话语与翻译研究。

Abstract: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ocietal paradigm of discourse studies, the linguistic paradigm of discourse studies is seen developing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to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DS). After discussing the tenets and insights provided by CDA, the paper proceeds to account for the initiative effort made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CDS facing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real world and the academic. It is recognized that this new generation, while still faithful to the interests and ideas of Fowler as the first generation and Fairclough, van Dijk, and Wodak as the second, is trying to bring this academic endeavour beyond “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a new stage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Key words: discourse studie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DS); paradigm; theory

1.0 引言: 范式与路径

话语研究,顾名思义,是对“话语”的研究。而“话语”则是一个在不同学科有着不同意指的术语。田海龙、程玲玲(2010)从概念史的角度区分了“话语”这个术语在西方学术界不同学科里的含义,包括在社会学、语言学、以及批评话语分析学科里的含义。尽管话语的概念在这些学科里有所不同,但是,话语这一概念在这些学科里的出现及其意义的演变却有着一条相似的轨迹,那就是,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延续了一条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或曰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变轨迹。例如,在语言学领域,话语概念的出现(见 Harris, 1952)是由于语言学家试图摆脱结构主义语言学将研究的重点禁锢在孤立的“词与句”而非连续的、由句与句构成的篇章上面,而在社会学领域,话语概念的出现是基于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由“我们是如何认识对象的”转向了“我们是如何表述对象的”(田海龙, 2014)。

这样,就不难理解话语这一概念实际上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而诞生,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也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而越来越深刻地被人们所认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按照刘亚猛(2008)的分析,源于对西方自 17 世纪以来三百多年间人们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普遍认为一切有意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得到实验检验并获得确定答案这样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现代哲学思想的质疑,通过这种质疑,西方思想学术界开始从对科学理性不加分析的盲目信仰中醒悟过来,并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建构作用。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特别是对话语的认识,则是依据了当代社会中那些交流沟通方面的本质特征。在当代社会,语言的使用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程度已到了一种融为一体的地步,人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话语的一个部分,正如克瑞斯(Kress, 2001)明确指出的那样,社会不是在话语的周围,不是和话语有关联,也不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相反,社会即存在于话语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讲,在互联网通讯新技术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政治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背景下,话语已经成为社会本身(Cao & Tian, 2012: 2),它建构和传播着人们的各种经历。

基于此,我们可以给“话语”一个初步的定义:话语首先是指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各种场合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如此,话语还包括与语言运用有关的各种因素,包括诸如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和机构利益这样的社会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对话语的研究就不可能局限在对语言本体的研究上面,也不能限制在对语言运用本身的研究上面;相反,话语研究需要涉及语言运用中的各方利益和价值取向,需要涉及在语言运用中发挥作用的各方权力及其关系。

如此认识话语研究,实际上预设了话语研究的两个不同路径(approach):一个是语言学路径,一个是社会学路径。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路径侧重研究语言运用,试图透过语言运用这一窗口探测与语言运用交织在一起的各方利益纠结和权力斗争。这种研究路径与话语研究的社会学路径不同,如与侧重社会发展、通过观察不同社会现象(如疯癫、罪犯)的产生和发展来认识语言在其中的建构作用的研究路径不同。这后一种研究路径,如田海龙(2009)指出的,可归于话语理论的关注领域,而前者可属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范畴。

在研究路径上对话语研究进行分类,就如同法叟德(Fasold 2000)把社会语言学分为“语言社会学研究(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和“社会语言学研究(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一样,有助于体现不同的研究视角,突出研究的不同重点。然而,如果要体现从事话语研究的学者群体共同认可和遵守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例如,将话语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联系起来,那么,话语研究的这两个路径亦可表述为两种不同的范式(paradigm)。具体来讲就是,话语研究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建立在对话语的语言学分析基础之上,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留下的痕迹,唯有分析这些痕迹才可追踪社会实践的走向、认识话语产生的影响及其建构作用。与此不同,话语研究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以宏观的理论分析为研究准则,在一个相对较大的历史文化视野里认识话语对社会的建构作用。

可见,如果“路径”表明一个研究的视角或侧重,那么“范式”则表明从事某个领域的研究应普遍认可并遵循的共同信念,包括这个学科领域的概念、理论、模型、范例及工具。以此为出发点,本文讨论话语研究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即考察批评话语分析/批评话语研究在理论层面的一些主张和原则,重点在于这一语言学研究范式从批评话语分析向批评话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讨论西方一些学者近期提出的、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区别的“批评话语研究”的一些理论特征。通过分析话语研究在语言学研究范式方面发生的一些变化,呈现话语研究在研究范式方面的最新发展动态。

2.0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与洞见

批评话语分析有别于以往任何语言学流派的特征,从其诞生的那一刻就鲜明地呈现在学者的面前。这里有必要重复这一范式开拓者的一些重要且经典的主张:

费尔克劳和沃达克的主张:1) 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2) 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演的场所;3) 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是社会和文化再生和/或变化的场所;4) 话语从事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结构展现、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或对其进行质疑;5) 话语是历史的,它应被置于语境中加以考察;6) 文本与社会的关系经由中介产生,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7) 批评话语分析对文本结构不仅仅描述,更注重解释;8) 话语是社会行动的形式,它揭示权力关系的隐晦性。(Fairclough & Wodak, 1997: 271-280)

范代克的主张:1) 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是注重社会问题和政治议题,而不是当前热门的理论问题;2) 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充分的实践性的批评分析通常需要多学科的联合研究;3) 批评话语分析不仅仅是对话语结构进行描述,而是对它们与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相关的性质进行解释;4) 批评话语分析注重研究话语结构如何作用、确定、再现或挑战社会中权力和统治关系以及如何使这种权力关系合法化。(van Dijk, 2001: 353)

批评话语分析的这些原则主张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初期并非完全得到认可,而且其中的几个主张(如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及它自诩的政治使命)还受到强烈质疑。这些质疑的出现,一方面有批评话语分析自身需要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研究范式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过程中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碰撞和冲突(许力生, 2013)。在不同观念的碰撞中,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这些经典主张也随之越来越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所遵循的准则,成为指导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原则。

因为经典,所以认识这些主张的深刻含义亦非易事,这对于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者是如此,对于某些声称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这亦是如此,因此便有了对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不断再认识的必要过程。田海龙(2016)通过讨论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关系、与积极话语分析的关系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的应用这三个问题,指出批评话语分析之所以是批评话语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批评话语分析注重研究话语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即注重研究“话语的社会功能”或“话语功能性”,研究话语在参与和再现社会实践、构建社会事实、社会关系及社会身份中所发挥的作用。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本质特征同时预设了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作用实施者的地位和权力及其所持有的价值取向的关注,预设它在本质上具有社会科学领域中福柯传统的话语分析的基本特征。

认识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这一特点,还不能说明认识了批评话语分析的根本属性,原因之一

便是话语研究的社会学范式也具有探究话语功能性的特征。能够与社会学研究范式相区别、并凸显批评话语分析这一话语研究语言学范式特征的是批评话语分析注重对文本的语言学分析。如果放弃了这个基础,批评话语分析同样不复存在。

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对话语(文本)的语言学分析研究话语功能性的鲜明特征不仅使其与其它的语言学流派相区别,同时也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壮大。但是,如果认为其发展壮大仅仅是基于对文本的语言学分析并借此来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够的。换言之,批评话语分析发展成一个有用的话语研究范式,并非仅仅是因为其极具说服力的理论主张。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深入探索以及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奠定了批评话语分析发展成为一门具有解释力的学问的基础。

在探索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批评话语分析不同于其前身批评语言学,不像批评语言学那样认为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简单的、直接的联系,不认为一种语言表述(如名词化或被动语态)可以直接反映或体现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参见田海龙 2006)。相反,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是由媒体作为中介的。例如,种族歧视的语言之所以体现种族歧视这种意识形态,并不是因为这种语言本身具有种族歧视的意思,而是因为种族歧视语言的制造者或收听者的大脑依据自己对相关语境的判断所做出的结论。这里,在种族歧视话语与种族歧视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种“语境模式(context model)”,人们通过不断地、实时地对相关语境进行“社会认知”,将话语的生产与理解与社会语境联系起来,才可以实现对话语意义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语境模式”起到了连接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媒介作用(van Dijk 2009a: 66)。

可以说,这种语言与社会之间由媒介搭界的间接联系为批评话语分析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契机,而对连接语言与社会媒介体的探索不仅促进了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深入,也促成了批评话语分析不同流派的产生。例如,在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话语秩序”被认为是连接语言与社会的媒介体。在他早期提出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分析框架中,费尔克劳(Fairclough, 1989; 1992)通过分析话语实践(话语的生产与消费)来探索文本与社会的联系;在他后来的研究中,费尔克劳(Fairclough 2003)更加明确了对话语实践的认识,通过分析“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和“语体链(genre chain)”来探索话语与社会的联系。再如,沃达克提出的“话语-历史”研究路径同样认为话语与社会的联系是由媒介连接的。类似的观点还有斯格伦提出的“媒介话语分析”路径(Scollon, 2001; 参见田海龙 2007)。正如卓根森和菲利普指出的,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探索连接语言与社会的媒介体(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 69-70),而这也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创建非常相关(Weiss & Wodak 2003: 21)。如果把批评话语分析所提供的认识语言与社会之间这种间接而复杂的关系的洞见与其发展壮大的历程联系起来,我们会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先驱们肃然起敬。

3.0 批评话语研究: 理论与概念

批评话语分析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是为学界所公认的。但是,它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或许,就像“批评话语分析”对“批评语言学”有所发展一样,“批评话语研究”这一术语标志着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早在 2009 年,范代克提出“批评话语研究”这个术语,其初衷是避免将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批评路径误认为是话语分析的某种方法。他(van Dijk 2009a: 62)指出,批评话语研究这一更为宽泛的术语体现出其批评路径不仅包含批评分析,同时还包含批评理论及批评应用。他同时强调,批评话语研究不是一个方法,而是具有多学科性质的话语研究中的一个批评性视角、立场和态度(同上)。他认为,批评话语研究的特征不是体现在其采用的方法上面,而是体现在从事批评话语研究的学者身上。这些学者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此,他们关注社会中的不平等、关注权力滥用问题,并通过自己的语言学分析曝光那些文本和谈话中存在的语言运用形式,进而助力与这些不公正进行对抗(van Dijk 2009a: 63)。

仅就范代克的这些论述而言,他对“批评话语研究”的定义与他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定义没有本质的区别。例如,与《批评话语分析方法》这本书第二版(Wodak & Meyer 2009)中的论

述一样,在这本书的第一版(Wodak & Meyer 2001)中,范代克同样认为批评话语分析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批评视角,是带有态度的话语分析,它关注社会问题,尤其关注话语在生产 and 再生产权力滥用中所起的作用(van Dijk 2001: 96)。然而,所不同的是,在2001年范代克认为“批评话语分析”不是一个可以直接用来分析社会问题的理论(van Dijk 2001: 96),而在2009年范代克提出“批评话语研究”则明显指向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建构(van Dijk 2009a: 62)。

范代克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情结是有其原因的。从范代克的学术自传(van Dijk 2004)中可以看到,范代克早期进行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是揭露媒体中的种族歧视,为此还被人告上法庭。进入21世纪,在众多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他更多的关注意识形态产生的机制问题,从社会认知的角度进行理论建构。分别于2008年和2009年出版专著《话语与语境》(van Dijk, 2008)和《社会与话语》(van Dijk 2009b),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所致力于的“社会认知”这一批评话语分析路径。在这两本理论著作中,范代克在分析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对语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全新的语境理论。这种理论认识到语境由社会成员参与话语活动时不断地、实时地进行主观建构这一特征,进而认为正是这个被称为“语境模式(context model)”的主观建构体影响着人们说话、阅读、倾听和理解的方方面面(Tian 2011)。如此,范代克的理论强调,社会结构只有通过语言使用者对语境的主观建构这一媒介或界面才能影响话语结构。

范代克提出“批评话语研究”这一术语,目的是要强调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需要理论建构,他的这个意图在克瑞兹诺斯基(Krzyzanowski)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重要的学术期刊《话语与社会》2016年第3期组织的一个题为“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与概念挑战”的专辑中得到了继承。在这个专辑的前言文章里,克瑞兹诺斯基和福特纳(Krzyzanowski & Forchtner 2016: 256)写到,这个专辑“强调有必要更多的关注批评话语研究中概念和理论。我们特别想强调,在被称为后危机时代或‘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21世纪第2个十年里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面临许多来自现实世界或社会和学术的挑战。为了迎接这些挑战的双重性,专辑里的文章强调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必须从现实世界和学术世界两个方面被重新审视。”

这个专辑在理论上发展批评话语研究的努力一方面基于对现实世界中新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基于对批评话语分析现状的认识。就前者而言,克瑞兹诺斯基和福特纳(Krzyzanowski & Forchtner 2016: 256)认为,当下社会正在经历许多话语方面的变化(discursive change),这些体现为当代公共话语新特征的话语变化包括“后英雄”社会的兴起及对过去历史具有区别性的建构、公共及其它领域话语愈加断裂和碎片化、技术的作用在社会中广为渗透并对话语施加影响、民主在形式上稳定的民主体制里坍塌、以及最近随着作为后现代社会主要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发展而出现的金融、经济和移民危机,等等。这些新的社会问题与批评话语分析最初所关注的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有所不同,因而也需要新的理论加以解释和分析。就后者而言,克瑞兹诺斯基和福特纳(Krzyzanowski & Forchtner 2016: 254-5)注意到,批评话语分析最初是通过分析“大众传媒文本中的词汇-语法意义”来关注“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等问题,所依据的理论包括福柯的话语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伯恩斯坦的语言社会学理论、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以及包括文本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辩论修辞在内的多个语言学理论。他们认为,批评话语研究在坚持这些批评话语分析的核心内容的同时,理论视野需要拓展,研究方法需要更新。

实际上,这个专辑在更广泛的关于话语的社会理论背景下,重新审视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一些可以进一步借鉴的理论。例如,玛盖克瑞斯特(Macgillchrist 2016)通过探索当今媒介化的世界,建议批评话语研究借鉴“后基础主义(postfoundationalism)”思想,包括拉克劳(Laclau)的思想。他认为,这样一种理论可以将破裂、中断、不稳定等问题置于研究的中心。赫兆格(Herzog 2016)通过讨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的标准批判(normative critique),认为这种源于批评话语分析福柯立场的批评需要被最初在后黑格尔理论中发现的内在批评(immanent critique)所修正。因此,他的文章为批评话语研究引入了后黑格尔的理论,马克思的理

论以及批评理论。福特纳和斯内柯特(Forchtner & Schneickert 2016) 观察后现代社会中话语的混杂性和更具冲突性的特征,认为布迪厄(Bourdieu) 的“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 中的“习性”、“领域”、“资本”等概念对批评话语研究非常有用,为研究由不同领域构成的社会中的各种冲突提供了概念工具。克瑞兹诺斯基(Krzyzanowski 2016) 通过观察当代社会中话语(如在政策、媒体和政治语体中) 的概念本质,提出批评话语研究需要引入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 的理论,以便强调概念的策略运用在使规则的逻辑合法化中的作用。同时,他还提出要借鉴伯恩斯坦(Bernstein) 关于“再情景化(recontextualization) ”的概念。他认为,概念史的理论 and 再情景化的概念可以帮助批评话语研究认清当代公共话语和控制性话语的意识形态本体论,进而确定话语中概念的真正意义。

除了以上这些哲学社会学的理论,这个专辑还提出批评话语研究在语言学理论方面的扩展。例如,哈特(Hart 2016) 提出批评话语研究需要认知语言学的帮助来解决语言处理的本质问题,同时,他将认知语言学与多模态话语分析结合起来,扩展了克瑞斯和范柳文(Kress & van Leeuwen, 1996)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玛秦(Machin 2016) 基于对当代社会媒介及媒介化的模式和渠道多种多样特征的观察,认为语言与形象的关系问题是批评话语研究理论化的关键问题。他认为有必要从语言学理解文本与形象关系的传统出发,从社会符号学中汲取有用的东西。

4.0 结语: 超越与发展

2006 年,《山东外语教学》发表题为“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 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的文章,认为批评话语分析是批评视角的语篇研究继批评语言学之后进入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标志之一就是《话语与社会》1991 年刊发的“批评话语分析”专辑(田海龙 2006) 。在 10 年之后的 2016 年,同样是刊发在《山东外语教学》我的这篇文章是否可以认为《话语与社会》2016 年刊发的这个“批评话语研究”的专辑代表着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无论我们的答案如何,至少这个专辑的介绍性文章(Krzyzanowski & Forchtner 2016) 表明了这样一种渴望。在这篇文章中,克瑞兹诺斯基和福特纳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限定在“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议题上面,将分析对象集中在“大众传媒文本的词汇 - 语法意义”上面,将批评话语分析所汲取的理论局限在福柯的话语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上,将研究者锁定在费尔克劳、沃达克、范代克、克瑞斯和范柳文等学者群上,将研究方法归纳为以上几个学者的研究方法,如费尔克劳的“辩证 - 关系”方法、沃达克的“话语 - 历史”方法,范代克的“社会认知”方法,以及克瑞斯和范柳文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他们定义批评话语分析时使用的词汇是“原始的”、“传统的”,“基础的”,“核心的”、“以语言运用为导向的”。与这些形容词相对照,批评话语研究被认为是“新的”、“更宽广的”研究领域; 与批评话语分析注重“语言运用”不同,批评话语研究更注重“以语境为导向”的研究和“与活动者相关”的分析。批评话语分析是需要“被继承”、“被发展”的,批评话语研究则是发展的目标; 批评话语分析是注重分析实践的,批评话语研究是注重理论建构的。

如此将批评话语分析定义为“基础性”的“传统”,克瑞兹诺斯基和福特纳(Krzyzanowski & Forchtner 2016) 提出超越这个基础便顺理成章。而且,他们令人信服地指出当今社会的种种新的社会现象需要阐释,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可以借鉴。面对来自现实社会和学术界的挑战,批评话语分析需要发展,而用“批评话语研究”命名这一新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术语创新的问题,这也表明新一代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共同体,他们继承上一代学者(大多是他们的老师) 的思想,有所开拓并施展影响,也会像他们的老师将语言学范式的话语研究从“批评语言学”推向“批评话语分析”那样,将“批评话语分析”推向“批评话语研究”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 [1] Cao, Q. & H. Tian. Language, discourse and identity in globalized China[A]. In H. Tian & Q. Cao (eds.). *Reinventing Identities: The Poetics of Language Use in Contemporary China*[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2. 1 - 15.

- [2]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1989.
- [3]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4] Fairclough, N.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5] Fairclough, N. & R.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T.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C]. London: Sage, 1997. 258 – 284.
- [6] Fasold, R.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M]. Beijing: FLTRP & Blackwell, 2000.
- [7] Forchtner, B. & C. Schneickert. Collective learning in social fields: Bourdieu, Haberma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6 27(3): 293 – 307.
- [8] Jørgensen, M. & L. Phillips.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9] Harris, Z. Discourse analysis [J]. *Language*, 1952 28(1): 1 – 30.
- [10] Hart, C. The Visual Basis of Linguistic Mean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tegrating Cognitive Linguistic and Multimodal Method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6 27(3): 335 – 350.
- [11] Herzog, B. Discourse analysis as immanent critiqu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normative critique in empirical discourse studie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6 27(3): 278 – 292.
- [12] Kress, G. From Saussure to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The turn towards a social view of language [A]. In Wetherell, Taylor, and Yates (eds.). *Discourse Theory: A Reader*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29 – 38.
- [13] Kress, G & 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M]. Burwood: Brown Prior Anderson, 1996.
- [14] Krzyzanowski, M. Recontextualization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increasingly conceptual nature of discourse: Challenge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6 27(3): 308 – 321.
- [15] Krzyzanowski, M. & B. Forchtner. Theories and concepts i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Facing challenges, moving beyond foundation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6 27(3): 253 – 261.
- [16] Macgilchrist, F. Fissures in the discourse-scape: Critique, rationality and validity in post-foundational approaches to CD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6 27(3): 262 – 277.
- [17] Machin, D. The need for a social and affordance-driven 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6, 27(3): 322 – 334.
- [18] Scollon, R. *Mediated Discourse: The Nexus of Practi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19] Tian, H. Review of van Dijk's *Discourse and Context and Society and Discourse* [J]. *Language in Society*, 2011 40(1): 116 – 121.
- [20] van Dijk, T. A.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1st ed.)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95 – 120.
- [21] van Dijk, T. A. 从话语语法到批评性话语分析——简要的学术自转 [J]. 高彦梅译. *语言学研究* 2004 (4): 189 – 207.
- [22]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3] van Dijk, T. A.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9a. 62 – 86.
- [24] van Dijk, T. A.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b.
- [25] Weiss, G. & R. Wodak. Introduction: Theory,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G. Weiss & R. Wodak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1 – 32.
- [26] Wodak, R.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1st ed.)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27] Wodak, R.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9.
- [28] 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29] 田海龙.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 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 [J]. *山东外语教学* 2006 (2): 40 – 47.
- [30] 田海龙. 实践结点研究的批评视角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 (3): 1 – 4.
- [31] 田海龙.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32] 田海龙. 话语理论与语言符号学——福柯与巴赫金对后现代语言研究的启示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6): 14 – 20.
- [33] 田海龙.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 [C].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 (3): 1 – 9.
- [34] 田海龙, 程玲玲. “Discourse” 的含义及其汉译 [J]. *燕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 68 – 72.
- [35] 许力生. 话语分析面面观: 反思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 135 – 143.